



Yamazaki Ansai's View about the Name and Origin of the State Nihon [Nippon] : A Study of Bunkaihitsuroku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tw 出版者: 『人文学論集』編集委員会 公開日: 2025-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Wan, Lil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2002756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 ——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萬麗莉

引言

《文會筆錄》共二十卷，內容依次涉及《小學》《近思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樂經》《春秋》以及有關周子、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及中國元朝、明朝和朝鮮的論述。目前圍繞《文會筆錄》的研究視角主要是採用文獻解讀的方法探討闇齋朱子學。

¹可見《文會筆錄》一般被學界看作是山崎闇齋（1618-1682）儒學集大成之著作。而筆者注意到《文會筆錄》四之《論語》以及八之《書經》中有大量關於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的記錄，與山崎闇齋晚年神道國體觀及日本型中華主義的架構密切相關。因此，在“儒學集大成”之先有觀念的基礎上對《文會筆錄》進行再解讀便顯得尤為重要。

一、山崎闇齋日本國號考

德富蘇峰曾指出：“闇齋先生與義公（指德川光國）共究其道，可謂徹底把握我國民之真髓者。真髓把握者何也？謂考察日本歷史之骨髓也。自皇室淵源而考察之，則必究日本歷史之骨髓也審矣。”²德富蘇峰認為山崎闇齋與德川光國皆為“徹底把握我（日本）國民之真髓者”的提法，顯然有誇大其詞之嫌。

¹ 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举出田尻祐一郎『山崎闇齋「文會筆錄」卷一「小學」积稿 1-4』（日本思想史懇話会編『季刊日本思想史（通号 17-20）』、1981-1983 年）；本村昌文『山崎闇齋「文會筆錄」卷三「四書」大学訳注稿』（日本思想史懇話会編『季刊日本思想史（71、73、74）』、2007-2009 年）；细谷惠志『山崎闇齋「文會筆錄」に見る明代朱子学：胡居仁を中心として』（『了徳寺大学研究紀要（9）』、2015 年、第 209-216 頁）；藤井伦明《日本闇齋学派的朱子学研究——以山崎闇齋〈文會筆錄〉为例的探讨》（《台湾师范大学报》、2017 年、第 1-30 页）、王晚霞《山崎闇齋濂溪学文献与文献学思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1 卷第 4 期，第 90-96 页）。

² 德富蘇峰：「歴史より観たる山崎闇齋先生及び山崎学」、伝記学会：『山崎闇齋と其門流』、東京：明治書院、1943 年、第 9 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但另一方面或為研究山崎闇齋思想架構提供了一種思路。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自皇室淵源”而“考察日本歷史之骨髓”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對日本國號的考察；二是對日本國起源的考察。

日本近世思想家多有涉及日本國號的言說，並散見於相關著述中，其意多在從各個角度強調日本國的優越性。³內藤湖南認為在日本國號論述問題上，松下見林的《異稱日本傳》受眾比較廣，但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的記錄卻要早於松下見林。⁴由此亦可見闇齋對日本國號考察具有重要的文本意義。筆者在下文中試選取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關於“扶桑”“倭”“日本”等國號的考察作一分析。

（一）對國號“扶桑”的考察

關於“扶桑”國到底所指何處，學界主要有墨西哥說和樺太說，但目前尚無定論。⁵山崎闇齋作為江戶初期的思想家，在二百多年前就能認識到此問題並作出理論考證，僅從這點上來看，《文會筆錄》在考證扶桑國問題上的文獻學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梁書·諸夷列傳》（唐 姚思廉撰）中關於“扶桑”國的記載如下：

扶桑國在昔未聞也云云……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裡云云。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纓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本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雲：“扶桑東千餘裡有女國云云。”《餘冬序錄》十六曰：“《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孔子不雲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⁶

³ 例如卜部懷賢的《釋日本紀》、忌部正通的《神代口訣》、一條兼良的《日本紀纂疏》、穀川士清的《日本紀通證》、松下見林的《異稱日本傳》、本居宣長的《古事記傳》《國號考》等。

⁴ 內藤湖南：『先哲の學問』、東京：筑摩書房、1987年、第22頁。

⁵ 朱謙之：《扶桑國考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⁶ 日本古典學會：『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359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山崎闇齋對上述《梁書·諸夷列傳》關於“扶桑”的記載提出質疑：

嘉（指山崎闇齋，筆者加）謂二十一史諸夷傳不曾知各國之史，往往賴譯說記之。如倭國、扶桑或一之或二之，或指我或否矣。何孟春此說⁷頗聞我事言之歟。⁸

山崎闇齋認為《二十一史》中涉及各國的內容均沒有史實依據，都是依照當時所傳譯本所作，《梁書·諸夷列傳》中關於扶桑和倭國的具體位置以及所指是否為日本均需存疑。

繼而山崎闇齋又補充論證如下：

嗣王三年不視國事，我先王然也。孔子之生當第二代綏靖天皇三十一年，連之名既見舊事神武紀。但大連之名第十四代仲哀禦宇置之，少連之名未之聞也。第三十代欽明天皇十三年佛法自百濟來焉，當梁承聖元年後乎大殆百年也。⁹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山崎闇齋對“扶桑”非日本國號的論證思路。

首先，針對何孟春《餘冬序錄》第十六卷中“孔子不雲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的提法，山崎闇齋認為與孔子同時代的第二代綏靖天皇時，《舊事紀》《日本書紀·神武紀》中可見“連”之名。第十四代仲哀天皇時出現“大連”之名，但並未聽過“少連”之名。據筆者所查，何孟春《餘冬序錄》中所提到的“少連大連”是指《禮記·雜記下》中所記錄的“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即孔子曾說過，少連、大連這兩個人都很懂得父母居喪的禮節，父母去世後的頭三天，一味哭泣，不進飲食；三個月內，哭泣祭奠沒有懈怠；到了一周年以後，還悲從中來，時時落淚；到了三年頭上還滿面愁容，而且他們還是東夷地方的人。而山崎闇齋所謂《舊事紀》《日本書紀·神武紀》中的“連”“大連”指示的是官職。可見闇齋此處的論證有失偏頗。

⁷ 指前條引文中《餘冬序錄》十六所提及的內容。

⁸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359頁。

⁹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359-360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其次，山崎闇齋根據《日本書紀》所記載的佛教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欽明天皇十三（552）年自百濟來焉”，即並非是《梁書》中所記載的宋大明二（458）年，“當梁承聖元年後乎大殆百年也”，由此得出慧深所來自的“扶桑”國不可能指代日本這一結論。

最後，山崎闇齋指出“扶桑”只是日本歌人仿中國詩集中的說法約定俗成，並非日本國號。

《淮南子》《山海經》扶桑、若木為二矣。後來雜史往往一指我言之也。然我人或仿他言歌書，有《夫木集》《詩集》，有《扶桑》，有《若木紀事》之書，有《扶桑明月集》，有《扶桑略記》，非我之號也。¹⁰

（二）對國號“倭”“日本”的考察

《新唐書·東夷傳》對“倭”“日本”的描述有如下說法：

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雲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¹¹

山崎闇齋對此評論道：

嘉（指山崎闇齋，筆者加）謂日本者，我倭之別名也。倭字，日本字共此雲。耶麻騰，謂之耶馬台，音之訛也。日本又雲比濃茂騰¹²，有大日靈貴號之訓傳焉。唐人謂倭國自惡名不雅，自言國近日所出之類，皆無證之言也。且日邊之謂六合之間，自各國指其東方言之，則猶之可也。日之在天也，運轉不暫停，更指何地而言之耶？其記皇代雖或訛誤而不至大謬也。¹³

山崎闇齋指明“日本”是“倭”之別名，而並非唐人所說，因日本“自惡名不雅”而“自言國近日所出”。闇齋認為《新唐書·東夷傳》中的說法“皆無證之言也”，並且利用地理知識指出太陽東升西落，各國均可以將其東方作為太陽升起來的地方。此外，闇齋又指出“倭”“日本”僅僅是“耶麻騰”

¹⁰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360頁

¹¹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371頁。

¹² 比濃茂騰：万叶假名，即“日（ひ）の本（もと）”，“日本”。

¹³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372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耶馬台”的“音之訛也”，並無俗雅之分。

山崎闇齋對中國史書中所指出的“扶桑”“倭”“日本”等國號問題進行了考察，這是他認識日本歷史的路徑之一。山崎闇齋依據《舊事紀》《日本書紀》等日本國史，將日本作為主體，中國作為客體，體現了江戶初期思想界所出現的“內外意識”“主體客體”之轉化。其實質是近世華夷秩序發生變化時日本學者所作出的自我認知的調整。

二、山崎闇齋日本國起源考

除對日本國號進行考察之外，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還對日本國起源之“太伯說”和“徐福說”有所考察和辯駁。

（一）對“太伯說”的考察

“太伯說”認為日本人是太伯的後裔，這一說法早在後醍醐天皇時已經由僧人中岩圓月按照《晉書》中“倭人自謂太伯之後”一說，編撰《日本紀》一書時強調過。但該說在提出後當即遭到了朝議的禁止，在此之後北畠親房在《神皇正統記》，一條兼良在《日本書紀纂疏》中也分別對此說進行了反駁與批判。而進入江戶時代之後儒學者又將“太伯說”提上日程，用“太伯說”來表示出日本國的尊貴以及與中華文明的密切連接，林羅山便是其中一人。此外，熊澤蕃山《三輪物語》和三輪執齋的《神道臆說》也對“太伯說”持肯定的態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對“太伯說”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基本上都是中華文明的推崇者和仰慕者。他們在華夷秩序的框架下，借助毫無根據的傳說加深了日本與中國的微妙聯繫。當然並非所有的儒學者都對“太伯說”持肯定態度，雨森芳洲就是一個例子。而除部分儒學者對“太伯說”表示反對之外，反對最激烈的還是神道家們。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四中就“太伯說”亦有大篇幅考察與辯駁：

《晉書》曰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太平御覽》《百川學海·倭下》，《御覽》引《魏志》，《學海》引《魏略》，皆雲自謂太伯之後。李延壽《北史》有此說，《梁書》亦雲爾，《續文獻通考》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等往往言之。國史無其征，則無稽之言。源親房、藤兼良議之是也，源說見《神皇正統記》，藤說見《神代纂疏》。釋圓月修國史用太伯之說，朝議禁止之矣。又《通鑒前編》周元王三年越滅吳下雲：“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日本亦雲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為倭也。”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日本部載《前編》說而曰：“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於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是金氏亦無稽而言之。元王三年實我王第五代孝昭三年也。《萬多姓氏錄》松野連出自吳王夫差也。然則所謂支庶入海者松野之先耳。他邦之人不曾知我書，其記我事者，往往賴商舶僧侶之口，誤年代失名實，可謂無征而言者。¹⁴

山崎闇齋首先否定了中國史書《晉書》《北史》《梁書》中認為“倭人自謂太伯之後”的說法，強調“國史無其征，則無稽之言”。隨後舉出北畠親房《神皇正統記》和一條兼良《日本書紀纂疏》中也明確反對此說。後醍醐年間，釋圓月曾在撰寫《日本史》時使用“太伯說”，遭“朝議禁止之”。元朝初年金履祥在《通鑒前編》中提到日本為“吳太伯之後”一說。諸葛元聲在《兩朝平壤錄》中否定《通鑒前編》所提到的太伯說，得出“是金氏亦無稽而言之”的結論。¹⁵山崎闇齋最後斷論“他邦之人不曾知我書，其記我事者，往往賴商舶僧侶之口，誤年代失名實，可謂無征而言者”。

此外，還有如下論證：

野馬台詩雲：東海姬氏國，俗儒因言天照太神泰伯也。以其姬氏，而誤謂之女體。三讓額秘在寶藏，此謬妄之甚。《伊勢鎮座次第記》《傳記》《本記》《寶基本記》《倭姬世記》神妙秘書，《類聚本源》《元元集》等絕無之。野馬台詩未見之載籍之中。俗謂寶志識而志傳所不道也。假令志作之，異僧謾語固不足據矣。噫儒生惑姬氏國之言，而欲誣太伯附之；佛者託大日靈之名，而欲牽大日合之。《元亨釋書》引神宮雜事為有據焉，雜事之為書，不問是非邪正，隨事隨記者也。聖武帝固惑乎？佛則所夢，其思之感爾，豈可以為事實而信之哉？是皆犯周禮造言之刑，違國神正直

¹⁴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四、東京：ベリカソ社、1978年、第210-211頁。

¹⁵ 據筆者所查證，“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於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的說法並非出自諸葛元聲的《兩朝平壤錄》，實際見於明朝郎瑛的《七修類稿》，山崎闇齋在此處有所貽誤。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之誨，實神聖之罪人也。¹⁶

山崎闇齋上文所提到的“俗儒”應指林羅山。林羅山在《本朝通鑒》中曾指出“日本始祖，吳太伯之胤也”，山崎闇齋以《神道五部書》《類聚神祇本源》《元元集》中並沒有相關記載作為論據，認為“儒生惑姬氏國之言，而欲誣太伯附之”。此外，闇齋還指出“佛者託大日靈之名而欲牽大日合之”。最後闇齋認為俗儒與佛者對太伯與天照大神亂加附會的行為“皆犯周禮造言之刑”“違國神正直之教”。

（二）對“徐福說”的考察

接下來山崎闇齋以相同思路對陳霆《兩山墨談》、顧應祥《惜陰錄》的“徐福說”進行考察和辯駁。

《文會筆錄》四之《論語》中還有如下記錄：

顧應祥《惜陰錄》十曰近閱《兩山墨談》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又曰仁山金氏《通鑒前編》勾踐滅吳注云云。金氏博綜群書其言當必有據。予考後漢東夷傳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二十許國……魏時有三十國瓊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禦中主，其後皆以尊為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以此觀之，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所據乃海中之洲耳，倭國固自若也，謂太伯之後者本出於晉書，蓋倭人既通中國，漸知今古書籍乃其自詭之言，恐未可全信。顧氏亦不曾知我事言之者也。¹⁷

山崎闇齋根據《唐書·東夷傳》中所提到的日本“自言初主號天禦中主”的記載，認為“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同時通過對陳霆《兩山墨談》“日本乃徐福之後”進行考證，得出“漸知今古書籍乃其自詭之言”的結論，否定了“徐福說”。

此外，《文會筆錄》四之《論語》中還提道：

¹⁶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四、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212頁。

¹⁷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四、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211-212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陳霆《兩山墨談》四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鑒前編》于勾踐滅吳之下注云云。金氏博綜群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眾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陳氏亦不曾知我事言之者也。¹⁸

陳霆在《兩山墨談》中認為“史傳日本國乃徐福之後”，且“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祖”，但山崎闇齋指出“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但徐福東渡後“風氣日開”，因此可以說“福乃再基之祖也”。

山崎闇齋雖然否定日本人是徐福之後，但肯定了徐福東渡為日本風氣教化所作出的貢獻。

最後，闇齋得出以下結論：

徐福止處其說不一矣。入倭之事國史不見焉。富士、熊野、熱田之靈祠者，皆我國神也。若徐福來止則其祠或有之，然舊記無之。絕海惟省等徒信他人無稽之言，俗儒往往亦雷同之。¹⁹

山崎闇齋反對用太伯和徐福東渡說來強調日本的個性與優越性²⁰，反對在中國史書的基礎上來構架日本歷史。韓東育教授在《“道統”的自立願望與朱子學在日本的際遇》中指出：“闇齋還試圖為‘日本主體性’創造出一個史學‘正統’。闇齋通過對孔子《春秋》和朱子《資治通鑒綱目》中‘華夷名分’的顛覆和編纂與《通鑒綱目》相對峙的《倭鑒》等工作，在理論上曾整理出一個優越於中國的史學統系。”

²¹那麼山崎闇齋所試圖建立的“正統”到底為何？他力證國號，反對“太伯說”“徐福說”意在如何？下文將作一探討。

¹⁸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四、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211頁。

¹⁹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381頁。

²⁰ 田尻祐一郎指出，山崎闇齋反對日本近世儒者模仿朝鮮的“箕子說”提出“太伯說”與“徐福說”來強調日本的個性與優越性，闇齋認為日本的優越性在於與天地始源，天皇萬世一系。（田尻祐一郎：『山崎闇齋の世界』、東京：ペリカン社、2006年、第276-277頁。）

²¹ 韓東育：《“道統”的自立願望與朱子學在日本的際遇》，《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第194、195頁。

三、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的意義

在上文中，筆者試圖打破《文會筆錄》作為山崎闇齋“儒學集大成”的已有定位，以《文會筆錄》卷四與卷八為重點，分析了其中關於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的記錄。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除了對儒學經典進行重新編著之外，還試圖弘揚日本國體，架構神道國體觀及日本型中華主義。

（一）自國意識的萌生與日本型中華主義的建構

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曾引用《北史》（唐李延壽著）卷九十四“列傳”第八十二關於“倭國”的記錄。其中對“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一文，山崎闇齋批註為“嘉按隋書複出之”。可見闇齋亦贊同“日出處天子”一說，提倡日本國優越性。《文會筆錄》八之《書經》中提道：

太宗謂中國唐季之亂，豈推唐季哉。秦漢已下皆然也。推上而極言之，則包犧氏沒，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湯武革命。若我國寶祚天壤無窮之神勅萬萬歷歷焉，則六合之間，載籍之傳，譯說之通，所未曾見聞也。且中國之名，各國自言則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豐葦原中國，亦非有我只得私也。程子論天地曰：“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程書抄略》載之，實至極之言也。²²

山崎闇齋認為日本“天壤無窮之神萬萬歷歷焉，則六合之間，書籍之傳，譯說之通，所未曾見聞也”，強調日本乃萬世一系之神國。在此基礎上借用程子之言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明“中”和“夷”只是相對而言，認為不應該從地理位置上來認定“中”。由此可以看出山崎闇齋對自國文化已經具有了相當程度的自信，萌生出了“自國意識”²³。闇齋借用程子之言“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看似具有相對客觀

²²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第373-374頁。

²³ 樋口浩造為思考江戶時代思想與近代民族主義的關係，在方法論上提出了江戶“自國意識”這一概念。並認為山崎闇齋學派的“自國意識”是近代民族主義的發端，且漸進式地發展到近代民族主義（樋口浩造：『「江戸」の批判的系譜学』、ペリカン社、2009年。）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性和科學性，但其表像下的實質依然是證明“是故我曰豐葦原中國，亦非有我只得私也”²⁴，包含了神國思想和萬世一系尊皇論的國體思想。

此外，《文會筆錄》還引用《朝鮮史略》《東國通鑒》《退溪集》《柳希春國朝儒先錄》等朝鮮史料，其中圍繞朝鮮“箕子說”指出“玄菟、樂浪本朝鮮之地，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設禁八條。是以其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飲食以籩豆，此仁賢之化也”²⁵，積極肯定了中國儒學對日本和朝鮮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中國明清鼎革之際以朱舜水為代表赴日乞師，這種歷史性巨變也給日本人帶來強烈衝擊，成為促成山崎闇齋自國意識萌生的原因之一。

山崎闇齋受到朱熹以及“東方朱子”李退溪的影響，打開了認識中國和朝鮮的大門，具備了一定的東亞視野。但隨著對朝鮮認識的加深以及中國明清鼎革的時代巨變，山崎闇齋逐漸萌生“自國意識”，最終走向神國國體思想之路。山崎闇齋試圖通過《文會筆錄》“正”其國史，強調日本優於中華。但其依據皆是《日本書紀·神代卷》以及《神道五部書》等包含神國思想和尊皇論在內的所謂史書，認為“國史無其征，則無稽之言”，表現出了一種武斷和狹隘的歷史觀。

山崎闇齋早年反佛倡儒，尊稱儒教母國“中國”為“中華”，在其著作中還可見多處“華人”²⁶的提法，此階段下可以說闇齋是中華崇拜論者。涉川春海（1639-1715）與谷秦山（1663-1718）的書信來往中曾提道：

²⁴ 山崎闇齋的天文地理知識是與天文學者涉川春海的交遊密切相關的。山崎闇齋曾對涉川春海的“大倭七曜曆”作出高度評價：“春海者，春日麻呂，安部清明以來之一人也”²⁴（日本古典學會：『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ペリかん社、1978年、第354頁。）闇齋在天文學知識上勢必會受到薰陶，乃至發出“此晦翁未聞之事，予得聞之不千古之一快乎”的感慨。

²⁵ 日本古典學會：『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文會筆錄」八、東京：ペリかん社、1978年、第363頁。

²⁶ 例如，“櫻之倭歌最多，而華人之題詠少聞焉。余讀唐于武陵之題，宋王安石之咏而知非華人不愛此花，但不如倭人之專耳”（日本古典學會：『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垂加草」卷三、東京：ペリかん社、1978年、第14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言“中華”、又言“中國”，今俗儒之專用也。先生（闇齋）曾亦言之。《日本書紀》中稱之為“西土”“西地”“大唐”。然（先生）曾稱之為“中華”，又稱“唐人”為“華人”。而晚年對日本遣異國文書中“日出天子致書日沒天子無恙”之語則多有讚譽。²⁷

按照上述涉川春海和谷秦山之言，山崎闇齋曾多次提到“中國”“中華”，但僅限於其思想早期。在他們看來，稱呼“西土”為“中國”“中華”是俗儒的行徑。事實上江戶前期的儒學者多抱有這種中國認識和慕華態度，對中華文化表現出了崇拜和仰慕之情。這種認識是同華夷秩序下中國的文化地位密切相關的。山崎闇齋到晚年創作《文會筆錄》，並通過論證國號，試圖“正”其國史，強調日本優於中華。其早年的中華崇拜只是一種表像而已，晚年則致力於建構日本型中華主義。山崎闇齋的神儒思想關係需要放到其整個思想歷程中去考察。

（二）神儒一致下神道國體觀的彰顯

伊東多三郎認為神儒一致論者在華夷關係上一般會強調日本國體之優越，而批判神儒一致論學者則幾乎都是中華崇拜論者。²⁸闇齋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也曾指出：“先生之雜信，吾不識其義也，則可知神儒一致之為妄論矣。”²⁹就山崎闇齋而言，其思想經歷了從朱子學到神道的轉向，單一地認為闇齋是中華崇拜論者，亦或是國體論讚美者則有失偏頗。

三上參次在《尊皇論發達史》中指出：“闇齋後期致力於神道，以《日本書紀》為基礎，成于古史研究。”³⁰可見闇齋後期轉向神道，依據《日本書紀》神代卷及《中臣祓》，從尊皇論角度來構築其國體思想。同時表現出了對舍人親王及其《日本書紀·神代卷》的大力推崇，正如他所提到的：“親王強識出群倫，端拜廟前感慨頻。渺遠難知神代卷，心誠求法豈無因”。³¹山崎闇齋看似在《文會筆錄》中用相對客

²⁷ 秦山谷重遠、都翁涉川春海：『神代溫義』、高知：高知県神職會、1941年、第655頁。

²⁸ 伊東多三郎：『近世國體思想史論』、東京：同文館、1943年、第14頁。

²⁹ 日本古典学会：『佐藤直方全集』、『軀藏錄』、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

³⁰ 三上參次：『尊皇論發達史』、東京：富山房、1941年、第209頁。

³¹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垂加草」卷三、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13頁。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一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觀的歷史學研究方法來論證日本國號和日本國起源，但最終將視角轉移到《日本書紀》及其“神代卷”上，明顯有悖於歷史客觀性，因此終將走向尊皇論之道。

山崎闇齋在寬文六（1666）年所作《會津風土記序》開篇便提到“自有天地則有我神國”“豐葦原者，葦牙發生之盛也。中國者，當天地之中，日月照正直頂也”，妄稱日本為“神國”。緊接著又提到“神武天皇都大倭國，而以大倭蒙諸天下，皇興回望，國形似蜻蛉，則謂之秋津洲。秋津者，蜻蛉之倭名也。大倭國是日神降臨之地，故謂之大日本豐秋津洲，而又以日本為天下之號矣。”³²至此，山崎闇齋完成了對日本國號的正名。朱謙之先生在對山崎闇齋的神國思想評價中認為：“闇齋站在祖國立場，推翻了外國崇拜者流的皇祖泰伯說，皇祖大日如來說，這都是很對的，但一定要把日本的實祚天壤無窮附會為神道，為大日靈貴之道，是否增加了日本國體的尊嚴，這在今日科學的光明照耀之下，不能不成為問題。”³³然而，從山崎闇齋排佛崇儒敬神的思想轉變歷程中可以看出，無論山崎闇齋如何推崇儒學，當他對作為外來思想的儒學之理解達到一定高度後，思考日本之道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這種轉變自然也影響到了儒學在日本的命運。因此，研究山崎闇齋的神儒思想，是探討與外來思想之儒學的碰撞下誕生的闇齋朱子學以及與之共存的垂加神道如何動態演變，最終回歸到了研究日本之道的形成上去。山崎闇齋的儒學生涯甚至包括其晚年的神道遍歷中，所追求的“真理”之一就是探索人倫關係，探討天、地、人以及與神的關係。正如山崎闇齋晚年所作的《朱書抄略》《張書抄略》《周書抄略》《程書抄略》均按照“天地”“人倫”“為學”來安排章節一樣，其學問體系基本圍繞“天地”“人倫”“為學”展開。這三點成為山崎闇齋一生的學問追求，既是階段性的，也是整個思想遍歷中的全部追求。

小結

山崎闇齋在三十八歲作為儒者開講之前，按照“述而不作”的理念編撰了系列儒學讀物，逐漸確立了其儒學正統地位。隨著開設講堂，寓教於學，闇齋對朱子學的理解亦逐日加深。其所編撰的著作中，除

³² 日本古典学会：『新編山崎闇齋全集』第一卷、「會津風土記序」、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72頁。

³³ 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朱子學思想之外，還包含了日本國體、日本國史學以及神道等內容。闇齋後又往返于京都和江戶之間，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皇室衰微的感慨與認識，誘發了其作為日本人的自覺意識，開始思考日本人之道。而其路徑與方法是重視日本歷史，但因其歷史依據借鑒了《日本書紀·神代卷》的神話體系，違背了歷史客觀性，最終導致山崎闇齋走上了尊皇敬神之道。山崎闇齋幼年時期受到其家庭重視《三社托宣》的影響而埋下了敬神的種子，編撰《大和小學》時開始形成了神道思想的雛形。他在《大和小學》的相關內容中點名了神佛習合的弊端，認為神佛習合直接導致了“胡佛入來，神道愈廢”。《大和小學》編撰完成十三年之後，即闇齋五十四歲時，在《藤森弓兵政所記》中表明瞭垂加神道的基本立場，並指明了神道研究必須以《日本書紀·神代卷》為基礎的主觀主義史學立場。在會津藩擔任保科正之賓師時，又將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踐，彙編了《會津神社志》並為其作序，同時協助保科正之完成了神社的整治工作。從這一點來看，山崎闇齋是個十足的實踐家。

闇齋自保科正之逝世之後返回京都，致力於儒學思想之大成《文會筆錄》的編撰。《文會筆錄》被視作山崎闇齋儒學思想之大成，緣於闇齋秉承“述而不作”，將“四書五經”以及《朱子語類》《朱子文集》等內容按主題彙編而成。內藤湖南雖在《先哲的學問》中指出山崎闇齋作為校勘學者，通過《文會筆錄》對中國史書中關於日本的記載進行考證和校對，指出闇齋的日本中心主義以及在江戶國體思想中的先驅性地位，但囿於篇幅有限並未展開詳細討論。³⁴筆者在先行研究基礎上，以《文會筆錄》為主要文本，從日本國號、日本國起源的角度分析了東亞視域下的山崎闇齋自國意識及其日本型中華主義的建構，由此可對《文會筆錄》作為山崎闇齋晚年集大成之著作有更深理解。

山崎闇齋在《文會筆錄》中的日本國號及日本國起源考，展示了其如何認識日本以及如何把握日本歷史的個性和優越性，對於探討闇齋國體思想形成是不可或缺的資料。闇齋前期對朱子學宗教式的虔誠促使其具備了一定的東亞視野，便於客觀看待中國和朝鮮事情。而後期作為一名日本人的自覺又促使其作出轉向，違背歷史客觀性，牽強附會地用朱子學的理论來詮釋神道，目光又縮小到狹隘的神道國體思想上去。闇齋作為日本朱子學的代表學者，在對朱子學日本化過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在肯

³⁴ 內藤湖南：『先哲の學問』、東京：筑摩書房、1987年。

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以《文會筆錄》為中心的考察

定山崎闇齋為朱子學在日本傳播作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也應該批判性地去看其神國思想。“作為學問的闇齋朱子學”和“作為道與教的垂加神道”是山崎闇齋思想精華的總括，全面、客觀的視角，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山崎闇齋思想的全貌及其在日本近世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四川師範大學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 2022 年度專案“山崎闇齋日本國號及日本起源考——以《文會筆錄》為中心”（項目編號：GBYYB202201）的成果。

[作者簡介]萬麗莉，女，教育部高校國別和區域研究備案中心四川師範大學日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